

# 总 序

古往今来，历史上大的翻译活动的勃兴总是与波澜壮阔的经济繁荣或文化复兴息息相关，或者说影响巨大的翻译活动总是伴随着文化复兴。古罗马文化的崛起以翻译古希腊作品为先导，拉丁文《圣经》文本的翻译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传播相生相伴，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见证了阿拔斯王朝对异域文化的吸收，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活动与文学文化创新交相辉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近代翻译家严复的译介开启了现代的启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肇。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翻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职业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且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翻译活动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

21 世纪是翻译的世纪。进入新世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以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不仅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在于是否对异国文化的清醒认识，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他者”文化，更在于是否能够大胆翻译介绍和吸收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外国优秀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之中。近年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和文化翻译事业空前高涨，“文化软实力”、“向世界说明中国”、“走出去”战略、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无不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对翻译的需求和渴望。值得一提的是，以社科基金形式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译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翻译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后，增进了国外对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国际影响力，受到了世界的关注。这一切为翻译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挑战。

虽然我国的翻译事业突飞猛进、成绩斐然，翻译市场潜力巨大，但翻译人才匮乏。据近期统计，全国从事翻译的人员总数多达 60 万人，已有语言服务企业为 15 039 家。形成对比的是，全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不足 2.6 万人，参加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并获得证书的人数不超过 2 万余人次。一方面是传统体制性的翻译人员在减少，另一方面是翻译的社会化越来越明显，翻译企业和翻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表面上的繁荣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翻译从业人员水平高下不一，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翻译市场亟待规范，翻译质量“伤不起”，译者的素质亟待提高，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种种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当其冲的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翻译社会化、翻译外包或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各类人才，其中包括高层次翻译人才、翻译项目管理人才等。毫无疑问，高层次实用型人才的匮乏阻碍了我国从翻译大国迈向翻译强国的步

伐。在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用人单位要求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逆差。

为解决好社会对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从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同意国内高校试办翻译本科专业,培养翻译专业人才。翻译从自古以来的一个“隐身”行当,成为一门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显学”。截至2011年,共有42所高校获批创办翻译本科专业。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在短短的四年里,翻译硕士专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目前获准试办翻译硕士专业的高校已达158所,翻译专业学位见证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不仅如此,自2008年内地培养的第一批翻译学博士顺利毕业以来,更多的高校已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并紧锣密鼓地招收翻译学博士。经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翻译学科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本、硕、博三级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基本设置完备。与此同时,翻译专业也成为各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热烈追捧的专业。

翻译硕士专业的设置顺应了国内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恰逢其时。它一方面根据国外专业学位的特点,借鉴吸收了国际上高层次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它结合我国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专业学位建设的道路。总体来看,翻译硕士专业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方面,与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不同,主要以培养适用型、高层次口笔译人才为主,既突出实践性和应用性,又要求其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百科知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对应用型为主的翻译人才的需要日趋迫切。尽快培养一大批既懂专业,又擅长于口笔译技巧的高质量人才,是各人才培养单位的使命。翻译专业学位教育不仅在师资上对教学梯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具有大量的翻译实践经验,也对现代化的教学条件,即软硬件环境,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CAT,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翻译技术和实习基地的建设等议题也亟待解决。更重要的是,在教材建设方面,凸显专业特色,打造翻译硕士专业品牌教材和品牌课程刻不容缓。

由于翻译学科设置的时间还比较短,教师、教材、教法等方面都还有待完善,做好师资培训,完善教材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成为当前翻译界亟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各出版社已经引进了一系列海外翻译理论书目,它们为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源。但相关翻译理论和教学书籍如何适应本土教学的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和翻译人才培养的模式,我们的教材如何更具有中国特色?各个高校背景不同,师资条件、办学设施不一,如何办出MTI的特色?翻译专业教学与各种职业训练的教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鲜明特点?翻译专业学位的翻译教学与翻译本科,甚至学术型翻译教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翻译专业学位课程设置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带着以上问题,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高等学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经过充分论证后,编委会邀请了在全国有影响的翻译研究专家担任专家委员会成员,以指导本系列教材的编写。编写委员会还邀请了活跃在翻译专业教学第一线、具有多年口笔译经验的教师,共同参与编写这套教材。他们对翻译专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有着真切的把握。通过这些年对翻译专业学位学生的教学,编写者能更好地拿捏所编写的内容。

本系列教材的目的是为夯实翻译专业教学基础,强化口笔译技能,让学生尽快全面系

统地掌握翻译专业必备的知识。系列教材以英汉互译的技巧为基准,既涉及商务翻译、科技翻译、法律翻译、政经翻译,又涉及西方翻译理论原典的选读、文学翻译,既突出口译教学中的连续传译和同声传译,也强调笔译技能。同时,为了应对翻译硕士专业考试,还专门编写了《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考试指南》。体现了编者对百科知识的理解和作为一名译者应该掌握的主要人文社会及科技知识范围。总体来说,本套“高等学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在突出系统性和应用性的前提下,强调以下理念:

1. 实践与理论并重。理论与实践、笔译与口译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互为支撑。本系列教材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奢谈理论,也反对盲目实践。教材中既有实践性很强的经济、法律、科技翻译,也涵盖中外基本的口笔译理论。但实践性、应用性是统领整套教材的主要特点。

2. 技巧与实战衔接。本系列教材以技巧传授和训练为中心,以提高实战能力为目标。口译所选用的材料大多是实际翻译活动中的全真资料,题材广泛,内容多样。笔译教材的每个单元的练习材料与所讲授技巧密切结合。既注重学习的循序渐进,又注重学而时习之,讲练结合。通过本套教材的学习,学生可以逐步掌握翻译专业的技巧和内容。

3. 专业与通识并举。本系列教材在强调语言转换能力和工具运用能力的同时,也注重通识教育。这包括语言和文化常识、社会百科知识、跨文化交际能力与社交礼仪等。合格的高端翻译人才不仅要术业专精,而且要学识渊博、涉猎甚广。

4. 译才与译德兼修。本系列教材在强调翻译人才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也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训练。翻译硕士的学术训练不仅包括翻译技能,而且应该培养具有职业伦理道德的人。译家之四长德、学、识、才,缺一不可。现代化的职业素养要求的是操行和专业兼备、敬业认真、信守承诺、译技娴熟、双语超群的人才。

这套教材的编写者都具有丰富的翻译实践和教学经验,所以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很多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做法,体现了编著者对新时期翻译学科的发展,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翻译教学、翻译教材编写的一些独特思考和尝试。诚然,这些尝试也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检验和修正。因此,我们欢迎各位师生在使用本系列教材的过程中给我们一些反馈和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以共同推进我国翻译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在撰写完总序之时,我要感谢催生本套教材的编审谢群英女士,没有她创造性的理念和认真执著的精神,就不会有这套教材的诞生。此刻,正值2012年元旦的温馨时刻,窗外万家灯火,一片祥和夜色,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爆竹的响声中,旧的一年过去了。人们喝着过节的屠苏酒,在春风送暖的日子里,张开双臂迎接着新事物的来临。翻译专业何尝不是一种新生事物?“总把新桃换旧符”不正是对翻译的符际转换最好的表述吗?的确,翻译正好体现了符号与符号之间转换的精髓,在这种转换之间,我们迎来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易(译)之道。

刘军平

2012年1月1日

# 前言

翻译是人类相互交流和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活动形式。从最早的《圣经》、佛经翻译活动直至现代社会利用各种电子工具、翻译记忆工具、互联网等手段进行翻译,翻译历经了多个时期的发展,期间跌宕起伏,高潮迭起。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不断发展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和繁荣。社会发展至今,翻译活动已经渗透到全球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类活动,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翻译活动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人类需要对翻译进行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因而对翻译学科知识进行全方位的普及成为了必须。

要在一本书内展现翻译从萌芽至今的历程,其选材难度不亚于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对无数的星星进行甄别和挑选,并将其光芒汇聚成束。如何将翻译发展各阶段的代表性内容囊括在内,如何在方寸之间展示众多翻译家们的风采,如何实现其内容广度和深度的矛盾统一,如何满足各类读者对本书的期待……无数个难题摆在编者面前。考虑到目前翻译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本书首先关注内容的广度,对翻译的基本概念、标准、分类、策略等进行概述,进而按照时间顺序对中西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家、翻译教育与研究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阐述。我国自2006年起教育部在部分院校建立了翻译系,2007年起开始招收翻译硕士专业研究生(MTI),翻译学正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结合我国翻译教学与研究发展的现状,本书用一定的篇幅展现了我国翻译教学机构、翻译研究核心期刊及重要的翻译赛事,为读者勾勒出国内翻译教学及研究方面的轮廓。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益发达和普及,现阶段的翻译与计算机技术之间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密不可分,将计算机辅助翻译及相关技术介绍给读者也成为必须,因此,本书特设计算机辅助翻译(CAT)与翻译服务方面的内容,介绍CAT的基本概念、常见的翻译软件及翻译语料库;同时结合目前的翻译市场,介绍了翻译服务的基本要求。本书的最后部分为翻译词典与工具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各种纸质词典与在线词典和翻译工具,可为读者提供各类专门词典信息及网络词典资源。

遵循百科知识类书籍的编撰体例,本书按内容类别分章节安排,如无特别说明,章节下的内容一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为照顾内容的连贯性,部分章节按照字母顺序、时间顺序或其他顺序排列,在目录中给出提示。为方便读者查阅,本书采用双目录:总目录为章节目录,正文目录为完整内容目录。由于编撰时间的限制,本书内搜集的部分材料截止时间为2014年1月。

本书特色在于将翻译研究方面的知识 with 翻译教学及翻译实践方面的内容融汇在一起。既有翻译史方面追根溯源的资料,也有现代互联网技术与翻译相结合的介绍。使读者能在

有限的篇幅内花费有限的时间即可获得较为全面的翻译学科信息，对翻译学习、研究及翻译实践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书适用面广，既可供翻译研究人员查阅资料，又可为翻译初学者使用，为其提供较为全面的翻译知识介绍，便于其对翻译学领域的全面把握和了解；亦可作为翻译专业的本科及研究生阶段学员进行翻译学习和研究的辅助用书。翻译教学和研究人员可在此找到国内外翻译教学研究机构及翻译研究核心期刊等信息；翻译学员可在此了解各类翻译理论及翻译家的观点，获取国内外翻译资格认证机构的确切信息，还可了解国内各类重要的翻译赛事，为优秀译员展现自身翻译能力提供可能的途径；职业译员可在本书内获得纸质词典、在线词典及翻译工具的介绍，同时还能获得翻译服务流程方面的信息，为译员与市场的融合对接提供借鉴。

编撰过程中，多位专家和同行给予了编者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借此一隅表达发自肺腑的谢意。特别感谢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刘军平教授的鼎力提携和点拨。鉴于方梦之先生所编撰《中国译学大辞典》的权威性，本书的中外翻译家、翻译机构等部分借鉴了该书中的部分内容，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另由于编者学识水平、知识结构缺陷及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一定的疏漏和缺憾，敬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斧正！

吴咏花

2014年6月

|                    |      |
|--------------------|------|
| ► 第七章 计算机辅助翻译与翻译服务 | /188 |
| 第一节 计算机辅助翻译        | /188 |
| 第二节 翻译服务           | /194 |
| ► 第八章 翻译词典与工具书     | /198 |
| 第一节 纸质词典           | /198 |
| 第二节 在线词典与翻译工具      | /215 |
| ► 参考文献             | /218 |

1. 马丁·路德的《圣经》译本 /58
2. 《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 /58
3. 《钦定版圣经》 /58
4. 《通俗拉丁文本圣经》 /59
5. 《威克利夫译本》 /59
6. 《威廉·廷代尔译本》 /60
7. 宗教经典《圣经》的翻译文本汇总 /60
- 三、西方翻译实践史(按时间排序) /61
1. 拉丁文翻译肇始时期 /61
2. 宗教文本翻译时期 /61
3.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时期 /62
4. 文艺复兴翻译时期 /62
5. 17—19 世纪的西方翻译时期 /62
6. 20 世纪翻译时期 /63
- 四、西方译论发展史(按时间排序) /63
1. 西方古代译论发展 /63
2.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译论 /64
3. 西方 18—19 世纪的翻译思想 /65
4. 20 世纪 50 年代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 /65
5.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67
6. 21 世纪翻译研究新态势 /68
- 五、西方机器翻译史(按时间排序) /68
1. 20 世纪初—1989 年 /68
2.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机器翻译 /70
3. 现代机器翻译特点 /70
- 第二节 中国翻译史 /71
- 一、中国翻译史的主要阶段 /71
1. 陈福康的分期 /71
2. 李亚舒、黎难秋的分期 /71
3. 马祖毅的分期 /72
4. 王克非的分期 /72
5. 谢天振的分期 /72
6. 张景丰的分期 /72
- 二、佛经翻译史 /72
- 三、外国文学翻译史(按时间排序) /74
1. 早期外国传教士的文学翻译 /74
2.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萌芽期(1840—1894 年) /74
3.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展期(1895—1906 年) /75

4.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1907—1919 年) /76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的十七年(1949—1966 年) /78
6. “文革”十年(1966—1976 年) /79
7. “文革”结束至 21 世纪初(1976—2003 年) /79

#### 四、中国科技翻译史 /80

#### 五、中国口译史 /81

1. 课堂授课时的口译 /81
2. 外交领域中的口译 /82

#### 六、中国史上的翻译机构 /85

1. 大同译书局 /85
2. 广学会 /86
3. 广智书局 /86
4. 广州同文馆 /86
5.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87
6. 京师大学堂编译馆 /87
7. 马列学院 /87
8. 明末历局 /88
9. 墨海书馆 /88
10. 强学会 /88
11. 人民出版社 /89
12.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89
13. 上海广方言馆 /89
14. 四方馆 /90
15. 四夷馆 /90
16. 同文馆 /90
17. 文学研究会 /91
18. 译书公会 /91
19. 译书交通工会 /91
20. 益智书会 /92
21. 左联 /92
22. 三联书店 /92

## ► 第四章 中外翻译家 /94

### 第一节 国外翻译家(按出生年份排序) /94

1. 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公元前 284—前 204 年) /94
2. 涅维乌斯(Gnaeus Naevius, 约公元前 270—前 201 年) /94
3.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前 43 年) /94

傅雷：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奈达(Eugene A. Nida)：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入语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Baker(2001: 236)：翻译过程中不应受原文本、原文本对译出文本的影响或作者通过文本设置的特殊功能等的影响。决定翻译过程的应该是读者、用户等对译出文本功用和目的的需求。

#### (6) 交际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交际主义者认为，翻译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的交际过程。如：

Newmark(1982: 22)：交际性翻译，即译者尝试使译出语读者和译入语读者对同一篇文本产生同样的阅读效果。

Shuttleworth & Cowie(1997: 21)：交际性翻译指向译入语读者的需求，采用交际性翻译方式进行翻译的译者并不把原文本看作简单的语言单位，而是一种文本信息，同时，译者尽可能地保留原文本中的功能同时将其精确地反映给译入语读者。

列维(Jiri Levy)：翻译是一个向国外读者传达源语信息的交际过程。

### 3. 翻译标准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也是翻译工作者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我国译界最具代表性的翻译标准有：(1)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标准；(2)1935年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3)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的“神似”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4)1964年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的“化境”说。在国外的译论中，引证得最多的是等值标准和等效标准。等值标准不但要求译文与原文思想内容等值，而且要求语言形式上的等值。等效标准所追求的目标是：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同样顺利地获得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信息，包括原文精神、具体事实、意境风格等。传统的翻译理论历来强调一个“信”字，将“忠实”视为翻译的基本标准。张培基先生提出可用“忠实、通顺”四个字作为翻译标准。忠实不但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通顺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流畅地道。忠实与通顺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必须把握好分寸，兼顾两者，讲忠实时不妨碍通顺，求通顺时不影响忠实。

### 4. 翻译单位 Unit of Translation / Translation Unit

对翻译单位，巴尔胡达罗夫(前苏联)定义为：“源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单位。”并把翻译单位按语言等级体系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话语层”六层。翻译单位不宜太长，也不宜太短，以句子最为合适。从理论上说，句子是能够独立运用、句法结构完整的语义单位，是人们进行语言交际的最基本语义单位；就实践而言，英译汉的具体操作是在句子层次上进行的，译好句子就为篇章翻译奠定了基础。

## 5. 翻译的性质 Nature of Translation

翻译是一门具有独特的规律和方法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再创作”的艺术。首先，翻译具有科学性。翻译之所以被称作科学，是因为它涉及思维和语言，反映了存在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可用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语言加以描述，翻译有科学规律可循。拿英汉互译这个过程或行为来讲，只有基本上掌握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和异同，翻译起来才会得心应手。汉语和英语各有特点，既有类似之处，例如主谓、动宾和介宾的先后词序；又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例如英语有冠词，而汉语则无这种词类。以具有不尽相同特点的汉英两种语言来进行互译，正是翻译工作者的困难所在。要想胜任翻译工作，必须掌握两者对应的规律。其次，翻译具有艺术性。创作的确是不容易的，作者必须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还必须具有概括的能力和表达的技巧，塑造出成功的典型，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译者也同样必须具备应有的条件，并严格遵循一定的科学程序，字斟句酌地进行推敲琢磨，才能译好一个作品，才能保全原作的艺术价值。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再创作的过程。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中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思。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1954年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郭沫若也指出：“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它并不比创作容易。”普希金也有类似见解，认为翻译创作的目的是“再现”艺术作品。再次，翻译具有技能性，译者需采用增词、减词、切分、转换等方法。只有译者熟练地掌握了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才能译出好作品。因此，翻译具有科学性、艺术性和技能性的特点。译文的优劣取决于：译者除具备有关两种语言的应有修养和坚实基础这个前提之外，是否掌握了翻译的规律、方法和“再创作”的艺术技巧。

## 6. 翻译方法 Methods of Translation

翻译方法指译者根据一定的翻译任务和要求，为达到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具体的途径、策略、手法和技巧。翻译方法主要包括两方面：(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传达原作内容和形式的总的设想、途径和策略以及美学态度，多与翻译理论和学派有关；(2)有时翻译方法也指在翻译过程中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即翻译技巧。在翻译方法上，奈达强调通过分析原文表层结构(形式)，挖掘其深层内涵(内容)，再将原文的内容转化为目的语的内容，最后对目的语的形式进行重组和润色。他对自己的翻译方法作了如下描述：从理论和实际双重角度考虑，翻译更加有效的做法是：(1)将原文压缩成结构最简单而意义最明显的事件内核；(2)用最简单的结构将源语言的意义转译为受体语言，用符合受体语言表达风格和语义的表达方式构建译文整体。

## 7. 翻译方向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翻译方向指译者是把外语译成母语，还是把母语译成外语；也可指把一种惯用的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惯用的语言，或把一门外语译成另一门外语。

分过程。Levy 把翻译行为描述成翻译决策行为是因为他把它看作“一系列特定数量的连续局势——如游戏中的行动步骤——这些局势迫使译者从一些特定(通常是非常有限的)选项中作出必要的选择”。威尔斯(1994)对该术语做了进一步完善,提出决策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译者认知体系、知识结构、跟委托人或原作者对译作具体要求的认同感以及对文本的熟悉程度。

#### 14. 翻译理论 Translation Theory

翻译理论是指从翻译实践概括出来的相关知识的系统性结论以及对与翻译有关的现象或本质所做的系统描写或阐释,是对该学科系统化的理性认识。翻译理论这一术语通常还用于指“翻译学”整个学科。如 Popovic (1976: 23)将翻译理论定义为“对翻译进行系统研究的相关学科”,其主要任务是“规范翻译过程和文本”。而纽马克(1981/1988: 19)则将其定义为“人们已有或必须具有的关于翻译过程的知识体”。

#### 15. 翻译批评 Translation Criticism

翻译批评是指以一定的翻译标准为准绳,以科学的方法对译本或译论的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进行评判,对其不足之处进行理论上的鉴别,特别要检视翻译实践的跨文化交际效果,从中探索译者的审美境界、科学视野和艺术技巧,以提高译者和读者的鉴别能力。翻译批评可以从文学审美角度,也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对译文文本进行分析、评价和赏析。全面的翻译批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分析原作,着重了解作者的意图和原作具有的功能;(2)分析译者翻译原作的目的、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针对或可能吸引的读者对象;(3)从原作与译作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文字进行详细的对比性研究;(4)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评价译作,包括译者采用的技巧与译作的质量等方面的内容;(5)评价译作在译语文化或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

#### 16. 翻译史 History of Translation

翻译史指记述人类社会翻译活动和人们对翻译认识的历史。中国的翻译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有史籍记载的翻译史也已有三千余年。不同学者对中国的翻译史有不同的划分。一般而言,中国翻译史分为五个时期:(1)从东汉到宋朝的佛经翻译;(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3)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4)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翻译。

#### 17. 翻译行为 Translational Action

翻译行为指产生信息传递的某种过程,包括文本、图片、声音、肢体语言等各种各样的跨文化转换过程。这一概念由芬兰裔德国翻译家赫尔兹-曼塔利(Holz-Manttari)最先提出,他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了翻译行为理论,在这一理论下,翻译被看作一个跨文化交际过程,其最终产品是一个适用于特定场合和语境的文本。根据赫尔兹-曼塔利,翻译行为是指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为。

## 18. 翻译者(译者) Translator

翻译者是指翻译活动中的人这一主体。一名合格的译者需具备一些基本素质:(1)扎实的双语语言功底。语言功底不仅包括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知识,还包括对双语异同的敏锐把握能力及语篇能力。(2)深厚的双语文化底蕴。王佐良先生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也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不能算作真正地掌握了该种语言。因此,只有译者深入了解双语文化,才能做好翻译。如果王佐良先生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就不可能译出《论读书》、《温泉胜地》等脍炙人口的佳作。(3)丰富的百科知识。吕叔湘先生在《翻译工作和“杂学”》(《翻译通讯》,1951年卷第一期)一文中指出,要做好翻译工作,必须对原文有彻底的了解,而要了解原文,除了掌握词汇语法知识和熟语外,还必须掌握另一种知识——“就是字典不能帮忙的那些个东西: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情风俗,俚语方言,历史上的事件,小说里的人物,五花八门,无以名之,名之曰‘杂学’。翻译中最费事的就是这‘杂学’了。”因此,对译者而言,可谓是学无止境,平时要注意积累方方面面的知识以备不时之需。(4)较好地掌握翻译理论。翻译理论是译者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了解并掌握基本的翻译理论,不仅能够解释许多翻译现象,而且能够对译者的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从而帮助译者提高翻译能力。台湾著名学者何伟杰在其著作《译学新论》中曾经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比作绿叶与红花的关系,认为翻译理论可以帮助译者克服自身对翻译实践的认识中可能有的片面性。因此,一名合格的译者应掌握基本的翻译理论与技巧并将之灵活应用于实践。(5)灵活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当今社会是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应用。在许多情况下,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力对效率有着很大影响。翻译行业也不例外,一些翻译软件如 TRADOS 和翻译语料库不仅能帮助译者提高工作效率还能提高准确性。(6)高度的责任感。译者的责任感首先体现为具有崇高的政治责任感。无论何种情况下,译者都应该善于应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所译的内容,对那些有损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的东西要坚决加以抵制和批判;其次,译者的责任感还体现为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树立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态度。

## 19. 翻译转换 Translation Shift

“转换”(shift)是卡特福德独创的术语,意思是将原文翻译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等。转换可分为层次转换(level shifts)和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s)两种形式。层次转换是指语法和词汇层次之间的转换,可以在语法或者词汇层次上找到对等。如英语和法语之间单复数和性别之间的转换,这种翻译是自动的,译者别无选择。范畴转换是指偏离两种语言形式的对等。这是受20世纪60年代初韩礼德的级阶和范畴语法的影响,卡特福德把“约束等级”(rank-bound translation)和“自由等级”(unbounded translation)的概念应用到翻译研究中。约束等级上的对等,主要是在语素上达到对等,而自由等级上的对等,可能是某个等级,如从句、句子上或者其他层次上的对等。英语和法语之间有五种等级或者层次上的对等。偏离两种语言形式的范畴转换有以下四种:(1)结构转换,即语法结构的转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 译作的风格与笔调应当与原作保持一致(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in 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3) 译作应当和原文一样流畅(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泰特勒指出,这三原则是按照其重要性排序的,当上述三者不能兼得时,应采取第一原则或第二原则而忽视第三原则。

## 2. 读者反应论 Reader's Response

读者反应论的提倡者是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他将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作为评价译文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准。他认为,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言语接受者,要评价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文所能产生的反应进行比较,看两者反应是否基本一致。他强调说:“不对信息接受者的作用进行全面的研究,对文际的任何分析都是不完整的。”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使译文读者在读译文时,和原文读者在读原文时有大体相同的感受。

## 3. 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功能对等理论是美国著名翻译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其前身是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为了防止误会,他希望用这个新词来强调翻译的交际功能(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translating),这个替换并不是要否定先前的动态对等。实际上“功能对等”与“动态对等”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奈达认为,如果一个信息很重要,把它弄得模糊不清显然没有好处,除非原作者故意采取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功能对等强调的是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恰当方式重新组织信息的形式和语义结构而进行交际。例如,翻译 white as snow,如果一种语言里没有“雪”这个字,却有“霜”(frost)字, frost 也是白的,可以用“白如霜”来替换。也可用“白如雪”、同义比喻如“白如蘑菇”(white as fungus)来表达。如果都不行,可以用一个非比喻形式 very, very white(“白极了”)来表达。保存原作内容,必须改变形式。语言各不相同,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形式。原作者期望读者看懂作品,通常他会表达的只会是一层意思,而不是几层意思。

功能对等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功能上对等,而不是在语言形式上对应。他把功能分成九类,即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祈使功能(imperative function)、仪式功能(performative function)、情感功能(emotive function)、审美功能(aesthetic 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这些分类对判定原文的语言功能、理解和表达都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人们在表情、想象力、语法结构、语义类别、认知和描述过程中存在“同形结构”,所以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功能有其相似性;另一方面,缺乏“同形结构”也会给翻译交际活动造成困难。功能对等或者动态对等通常与形式对应对立起来,为了解决任意改变原文形式的做法,在理论上应该限制任意背离原文的做法。具体包括五种情况:(1)直译会导致意义上的错误;(2)外来语导致语义空白(semantic zero),读者可能自己填补错误的意义;(3)形式对应导致严重的意义不明;

(4)形式对应引起原文中模棱两可的意义;(5)形式对应违反目的语语法或损害译文文体和谐。不同语言在表达内容上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区别在于表达形式,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要从社会符号学出发,找出目的语内各种有效的表达形式。受奈达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翻译理论家科勒(Werner Koller)提出了内涵对等、外延对等、文本规范对等、语用对等、形式对等五个类型的对等,进一步发展了奈达的对等理论。

#### 4. 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动态对等”这一概念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于1964年提出,用于描述《圣经》翻译过程中两个基本方向之一。“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p.67)。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67),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

#### 5. 形式对应 Formal Correspondence

一般地,形式对应是指译文与原文在语言结构形式上的对应关系。根据卡特福德,当目的语范畴(如词素、词、词组、句子等)在目的语文本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对应源语范畴在源语文本中处于相同地位时,就存在着形式对应关系。与文本对等相比,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源语与目的语的形式比较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一个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范畴。奈达也用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这一术语指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

#### 6. 文本对等 Textual Equivalence

卡特福德将文本对等定义为一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存在于任何译文(或部分译文)与原文文本(或部分原文本)构成对等关系时的对等。如英语句子“My son is six”和法语句子“Mon fils a six ans”中的短语“My son”和“Mon fils”就是一种文本对等关系。Popovic则用文本对等指“文本句法轴上各因素的排列关系”(1976:6)。根据Popovic,文本对等取决于两个因素:(1)译者的表达情感;(2)存在合适的“表达手段”。

#### 7. 翻译对等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翻译对等”是用来描述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或其更小的语言单位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对应程度的术语。这一概念曾是20世纪语言学派研究的中心话题,曾引起很大争议。Hermans就曾把它称为“麻烦概念”(1995:217),部分是由于翻译对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多义词，对其含义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雅各布逊的翻译对等观。雅各布逊认为，确切的翻译取决于信息等值。他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观点来解释翻译对等的问题，并指出：“在不同的语际中求得对等是语言的主要问题，也是语言学的主要问题。”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在语内翻译中，是用一个语符单位代替另一个语符单位，对某个词的翻译可以选用同义词，也可以采用迂回表示法。但一般来说，同义词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词。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不会有完全的对等关系。人们通常不是用一种语言的语符，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单个的符号，而是代替更大的单位，即雅各布逊所称的“信息”。也就是说，在语际翻译中，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即逐词对应，而且也关注符号和符号组合的对等。这就是说，我们应知道整个话语的意义，更何况，在语符单位之间不可能有完全的对等。因此，翻译包括信息和价值两个部分，语言使用者不仅希望从话语中获得信息，而且希望知道为什么发出这样的话语。这些问题涉及内容、读者和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翻译涉及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要传递出对等的信息，欲使原文和目的语信息对等，由于两种符号系统之间的差异，语符单位之间一定要动态对等。语言和等值是雅各布逊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西方翻译理论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在两种语言中，概念的绝对对等是一种理想。即使英语的 *equivalence* 与德语的 *Aquivalenz* 这两个对应词，也不可能完全对等。雅各布逊指出，完全的对等是不可企及的，主要是原文的词汇有联想和含蓄的词义。因此，翻译中除了传递表层结构外，还要传递语言的深层含义。后期的奈达对对等有过较系统的论述。

(2) 卡特福德的对等观。卡特福德对等值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将翻译定义为“用另一语言(目的语)的对等文本材料替代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1965: 20)。并认为，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界定翻译对等的性质和条件”(1965: 21)。这种等值应该建立在动态，而非静态的双语转换机制上。卡特福德认为，在讨论翻译等值关系时，需要区分“文本等值”和“形式对应”两个概念。文本等值指特定的语境中，译语文本或部分文本，成为源语特定文本或部分文本的等值成分，如，英语里的“*Once bitten, twice shy*”在汉语里的等值成分就是“一次被咬，下次胆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实际上，翻译也就是在译语语境中寻找最大可能与源语语境重叠的等值成分。但有时会出现等值为零的对应，如“*The Sun Also Rises*”，译成汉语的对应是《太阳照样升起》，英语定冠词的汉语对应为零。“形式对应”是指任何译语范畴如单位、类别、结构成分，等等，在译语中尽可能占有与该源语范畴在源语中同样的地位。

(3) 奈达的翻译对等观。奈达认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之间，通过翻译可以找到语言对等的桥梁。他首先提出了四种语际模式：对应式转换、平行式转换、替代式转换和冲突式转换。对应式转换的目的是寻求对应体，指双语在思维表达形式上的对应或基本对应。平行式转换是语际转换中的最先选择，但并不是最佳选择。这种转换不但要注意语义的深层对应，而且要注意特殊文化背景。替代式转换指广泛地调整、变通，以代替源语的措辞或语句结构。冲突式转换的目的在于求得语义实质上的对应而舍弃对语言形式结构的考虑。其次，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的概念。奈达给动态对等翻译下的定义是：“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

其次是文体。”他后来又将动态对等换成了强调语用和语境的功能对等。“功能对等”除了突出文本内容信息的对等，也提出了尽可能追求形式上的对等。形式对等强调的是原文文本。这种对等，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地把原文的内容和形式都忠实地传达出来，译文读者在看译文时，要尽可能地觉得他自己就是原文语境中的一位成员，并且尽可能多地了解原文语境里的风俗、思维方式和表达法。“形式对等”是一种有意义的直译，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可以加注脚，原文形式有必要保留。“形式对等”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关注信息本身。译者关切的是接受语是否能与源语的信息成分密切对等。它瞄准的是忠实于原文结构，遇到不畅通的地方用注解说明。奈达的形式对等和形式对应的区别是，形式对应就是字对字地翻译(word-for-word)，而形式对等则是内容和形式都要对等。

## 二、国内翻译家提出的主要翻译标准

### 1. 化境 Ultimate Realm of Transformation

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1964)中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7世纪一位英国人赞美这种高造诣的翻译时，将其比作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化境”是指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 2. 兼顾两面 Consideration of Both Sides

这一标准是鲁迅在《鲁迅全集》(第6卷, 348页)中提出的。他认为：“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于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应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反对在文学翻译中极力使用归化的主张，提倡译文既要易懂、通顺，又要忠实于原文。

### 3. 神似 Spiritual Similarity

“神似”这一翻译标准，最早由茅盾(1921)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首先提出，并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一文中译述。但着力提倡并真正实践这一翻译标准的却是傅雷。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1951)中写道：“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在翻译中，“神似”是指必要时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地道的译文传达出原文的艺术意境。20世纪60年代，傅雷再次重申这一立场：“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此后，“神似”的翻译主张作为一大翻译标准被我国译界普遍接受。

的“新叶”代替摇曳欲坠的“老叶”。在《诗艺》的《论创新》一节中，他还指出了意译的重要性：“只要你不是浪费时间，留恋迂腐的翻译手法，只要你不是像奴隶一样将原文字字对应于译文，你就会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主题。”（A theme that is familiar can be made your own property as long as you do not waste your time on a hackneyed treatment; nor should you try to render your original word for word like a slavish translator.）他还根据自己的创作和翻译实践，制定出一套古典主义的文艺原则，提倡创新、平易、和谐、“寓教于乐”的风格。在翻译实践中，贺拉斯认为，译文应该忠实（*fidus interpres*），但忠实不是指忠实于原文文本，而是以目的语的读者（庇护人、客户）为尺度。与传统的忠实观相反，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传递信息，原文文本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东西。受其“寓教于乐”思想的影响，贺拉斯主张，原文文本可以按不同的方式移译，只要能满足信息的沟通就行。这是一种以交际目的和翻译功能为终极目的的翻译观点。总之，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教”与“乐”结合在一起（to teach, to entertain）。需要说明的是，贺拉斯主张意译，并不意味着翻译可以不切实际地任意发挥，“忠实”仍然是他翻译主张的第一法则。他强调译者修养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要有德行，有学识；二要有才华，有功力；三要有认真负责和明白清醒的创作态度。

### 3. 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的翻译主张

昆体良的翻译思想主要见于他所著的《修辞学原理》的第八、九、十卷，其核心是：翻译也是创作，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媲美，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译作要与原作“竞争”之说的翻译家。

昆体良认为翻译家不仅是“忠实的工匠”，而且是寻找崇高诗句灵感的人。通过翻译，译者可以提高写作风格，与原文竞争，甚至可以通过改编翻译，用编译的语言提高原文的质量：“不，我们可以为诗人表达的思想增加雄辩的力量，该简略的就简略，适当遏制他的热情。我不会让释义来限制自身，将原文只暴露在阐释之下。我的使命是用同样的思想和表达与原文竞争，审查原文”。（Nay, we may add the vigor of oratory to the thoughts expressed by the poet, make good his omissions, and prune his diffuseness. But I would not have paraphrase restrict itself to the bar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its duty is rather to rival and view the original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same thoughts.）（*Institutes Oratoria*, X）

他的这种“与原文竞争”的主张，与提倡异化的观点针锋相对。他一方面强调了译者的母语及译者主体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免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藩篱。他和西塞罗、贺拉斯都主张意译而反对字字对等的翻译，他们认为，对于修辞学来说，翻译只是一种训练修辞的工具。翻译诗歌注重的是诗歌的演说力量，而不是诗歌翻译本身。受其影响，罗马人用这种方法翻译了大量的希腊戏剧和诗歌。

### 4. 圣杰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翻译主张

杰罗姆在总结自己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的观点。他认为，译者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与“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